

## 第四章 溪湖人的島外戰事參與

二次大戰期間，台灣被日本政府比喻為「不沉的航空母艦」，即進攻東南亞的踏腳板，為兵員、艦隊、飛機、兵器、彈藥、糧秣等的集結基地。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並砲擊中途島、威克島與關島，<sup>1</sup>陸續展開對九龍半島、香港島、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英屬婆羅洲、菲律賓等地方之佔領。珍珠港事件後，隨著日本作戰戰區的擴大與局勢緊張，將南洋一帶納入日本施行「東亞共榮圈」內，台灣在南進政策中成為戰爭裡重要角色。

日本的擴張行動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至1942年夏天達到高峰，勢如破竹，其戰線拉長至澳北與澳西北海域，使外圍防線過於擴張。<sup>2</sup>在這些急速擴張的行動下，必須有人力物力的支援，台灣總督府因此配合提供資料蒐集、人才的培育，與被佔領地的經濟投資、開發石油、橡膠與醫療教育建設等。台灣屬於日本之殖民地，並非日本之國民，因此戰爭初期日本政府對台灣之軍事動員，以軍夫、軍屬之名義，主要是鼓勵台民到戰場從事勞動等後勤補給工作，而非作戰之士兵。<sup>3</sup>這些從昭和12年（1937）到昭和20年（1945）被台灣總督府招募而參與軍務者，一般咸以「台籍日本兵」稱之。軍夫與軍屬之類型繁多，工作性質有從事農業生產，如「農業義勇團」、「農業指導挺身團」等；有從事工業或建築軍事設施者，如「台灣特設勞務奉公團」；也有從事警務之「巡查」、「巡查補」；輔助行政之通譯；女性則有投入醫療的「看護婦」，以及以原住民身份的「高砂義勇隊」等。由上述眾多名稱的軍夫、軍屬，也顯現其種類的複雜性，而其目的皆是相同的，為日本戰爭提供自己的心力。

然而，珍珠港事變後，美軍亦正式對日宣戰，並與盟國合作，達成對德、義、日軸心國作戰之協議。日本即使佔領許多地方，仍無法使盟軍投降，亦無法結束戰爭，最終因美國投下兩顆原子彈而宣佈無條件投降。1942年6月的中途島戰役後，美軍開始由東南亞北進反攻，日軍遭受盟軍攻擊，節節敗退之中，此時所投入戰場的台灣人原是軍夫、軍屬，卻不得不「現地自活」或「現地作戰」，而在槍林彈雨中求生存。直到戰後，台灣人由被殖民者的角色，轉換為戰勝國的人民，其境遇與海外遣返之經驗，皆顯現台灣島民戰時的特殊經驗。

根據湯熙勇由戰後滯留在東南亞與日本等外地之臺灣籍民研究，認為其中身份、背景有所差異，戰時前往東南亞者多為參與軍務；前往日本以少年兵與留學

<sup>1</sup> 關島與威克島為菲律賓至夏威夷群島的連結要地。

<sup>2</sup> 劉鳳翰，《日軍在台灣：1895年至1945年的軍事措施與主要活動（下）》（新店：國史館，1997），頁432-443。

<sup>3</sup> 李國生，《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台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15-17。

生居多；前往中國華北與東北者，為從商、擔任滿州國行政與醫療人員；前往中國廣東（含廣州、海南島）多為從事軍務，福建則以平民及商人為主。<sup>4</sup>以下就地區別，分為菲律賓、新幾內亞、香港、泰國、海南島、日本，觀察溪湖庄人戰爭參與與境遇。

## 第一節 中國

自昭和 12 年（1937）七七事變以後，中日戰爭正式展開，日軍隨即攻佔北平、上海，年底攻佔南京。次年登陸九江，10 月攻佔廣州、武漢，昭和 14 年（1939）2 月進攻海南島，3 月宣布佔有新南群島（南沙群島），6 月攻佔廣東汕頭，此時日本已佔領中國南方沿岸。

1914 年出生的何丙寅先生，七歲時一隻眼睛因為長東西而失明，因而不可能被徵兵，他仍記得當時出征的情形：

第一批到海外當兵的人很風光，當時還規定一戶人家要出人歡送，也有鼓陣來到熱鬧。出發的前幾天，就歡迎他們役場，會有重要人士來演說，還掛旗子慶祝，印象中那一批人有活著回來，例如汴頭里的豬哥（人名），大竹里也有一個。但後來調去當兵就愈來愈安靜，靜靜地收到單子，默默去。（何丙寅，訪問記錄 18）

戰時熱烈的宣傳與鼓勵從征的氣氛，引起年輕的生命捲入戰局。當時正值於東溪湖國民學校擔任助教的巫總傳先生說：

當時很多青年人從軍，常有為國犧牲的消息，汴頭里一位年輕人叫楊木午，出發前曾慷慨激昂發表愛國演講，但出征沒多久就犧牲了，大家聽到消息都很感嘆。（巫總傳，訪問記錄 11）

### 一、海南島

太平洋戰爭主要戰場在南洋各島嶼，海南島之地理位置正可以連結中國戰場與太平洋戰場。日軍於昭和 14 年（1939）2 月 14 日攻佔海南島，並在南部的三亞設置海南海軍警備府。以三亞本身做為軍港，在其附近建立黃硫飛機場，當時

---

<sup>4</sup> 湯熙勇，〈恢復國籍的爭議：戰後旅外臺灣人的復籍問題(1945-1947)〉，《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7：2(台北：2005)，頁 393-437。

號稱遠東第一。<sup>5</sup>戰時台灣兵和軍屬派到中國戰區的較少，但是派遣至海南島卻是相反的情形，日本刻意經營這個銜接中國和南洋戰區的樞紐。台灣總督府也大量派遣軍屬和商社前往開發，估計約有三萬名人台灣在海南島。

### (一)巡查補

為了維護海南島當地的治安，也在台灣招募巡查補，以補治安警力之不足。昭和 16 年（1941）1 月與 8 月，首次分別有兩批以臺灣人為警察隊共 366 人，被派遣到海南島。<sup>6</sup>大正 4 年（1915）出生的洪在，原本在鄉裡的工作是務農與教導族中孩子漢文，包括三字經、尺牘、名言、佳言錦句與弟子規等。戰爭時期會報考巡查補的原因，除了日本愛國教育成功，還有為求生存。他的長子回憶說：

當時徵召軍夫時，鄉里的保正會填寫紅單，被填到的那一戶就要有男子出征。我的父親是出於自願報考，通過後，於 1942 年 10 月出征，也由於父親已經擔任巡查補，所以我們家可以不用再派人出征。（洪敦寬，訪問記錄 01）

目前洪家中還保留洪在考取巡查補所用的專業書籍，是由日本警務學會出版的《（外務省附海外駐劄內地、植民地勤務兼用）巡查養成講義錄》，分很多期出版。以第三期為例，顧問為陸軍中將岡澤慶三郎、元警視總監兼貴族院議員赤池濃、東洋大學教授高島平三郎。內容包含國語講義、作文講義（有佳文欣賞、寫作法與模擬試題）、口述試問講義（含議會政治、政黨政治、日本政局發展）、日本歷史講義（如幕府政治室町時代的文化、織田信長、尊王論...等等）、日本地理講義（如海防論、區域地理之境域、地形、氣候與產業）、算數講義（有比例、分數、最小公倍數等運算與應用試題）。另有一篇理學士渡邊滿述編寫的東洋地理講義，內有中國、印度支那、印度、亞細亞露西亞、馬來群島、西南亞細亞的地理人文簡介，並將中國分為「支那本部」、「滿州國」、「蒙古」。另有課外特別講座為「滿州國的歷史與地理」。

如第三章第四節所述，台灣青年或避免擔任戰場上的軍夫工作，或另謀待遇較佳的出路，而選擇準備參加考試，需要知識基礎，甚至包括專業技能的軍屬，為其選擇之一。該系列叢書由東京豐島區的良國民社出版，其封底廣告皆為考試用書，例如巡查、陸海軍軍人志願、鐵道員、陸上汽罐士等職業之考試與試題解答用書，可了解坊間亦有書籍資料提供民眾準備考試用。

<sup>5</sup> 鄭麗玲，〈海南島的臺灣兵（1937-1945）〉，《臺灣風物》46：3（台北：1996），頁 84-86。

<sup>6</sup> 湯熙勇、陳怡如編著，《臺北市臺籍日兵查訪專輯：日治時期參與軍務之臺民口述歷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1），頁 68-69。

## (二)軍夫

大正 6 年（1917 年）出生的楊昌堅先生，溪湖公學校畢業後，就在家中以務農為業。26 歲被徵召到海南島當軍夫，直到 1947 年才得以返台，或許是因為戰爭所產生的痛苦感受，返台後並無向人提起海外經驗。次子楊儒良先生僅能由母親得知一些片段，尤其是戰爭結束之後，台籍日本兵的複雜身份，在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任由其自生自滅之下，努力求生存。以下為楊儒良先生述說父親滯留海南島的困境：

1945 年 8 月日軍投降後，美方要求蔣介石將海南島的 300 萬日軍、日僑遣送回國，對於台籍日本兵，國民政府則置之不理。由於台籍日本兵戰前為日軍服務，海南島居民視之為「日軍」而藉機報復，父親和其他三位台灣人成為當地人發洩憤怒的對象，不得不躲到黎母嶺的山中。其中一位是來自基隆獅球嶺，一位住在溪湖鎮汴頭里，另一位不詳。

他們四人在山上的生活非常痛苦，不僅沒有食物吃，也不能生火，擔心炊煙會引起居民注意。在山上採集姑婆芋，<sup>7</sup>以軍刀削皮後，放在石頭上曬乾，雖然可以減少生物鹼，但仍有毒性，吃到整個嘴都腫起來。抓到肥大的蚯蚓，以溪水將其肚內穢物擠出，也是曬乾就吃。其他還有青蛙、蛇與野生水果。（楊儒良，訪問記錄 02）

同時也表達對國民政府之忽視感到不滿，以下為返台過程：

1946 年底，毛澤東開始反蔣，蔣介石才下令海南島居民不可欺侮台籍日本兵，於是父親等四人才敢下山，當時四人唯一且共同的財產是一把軍刀與一條軍毯。其中一人感染痢疾，留一個人照顧他，另外兩人則到村中幫人種田，一日的工資就是一個鳳梨罐頭裝滿的米。除此以外的食物，就是路邊所生的馬齒莧。四人流浪街頭，住在別人的屋簷下，下雨時，四人肩並肩披著那條毛毯，看著雨水如瀑布般從屋簷邊落下。

1947 年初，國民政府才派船將海南島的台籍日本兵送回台灣，父親在基隆港下船以後，過著如乞丐般的生活，一邊乞討一邊走路回到溪湖。那時正值冬天，戰後的台灣街上有許多流浪漢，父親身上綁著麻布袋禦寒，褲管一隻到膝蓋，另一隻只到臀部，滿身髒污走回家。奶奶看到以為是流浪漢還乞討，拿起掃把就要驅趕，卻聽到父親叫著「阿娘」，原以為客死異鄉的二兒子竟然活著回來！（楊儒良，訪問記錄 02）

<sup>7</sup> 姑婆芋主要中毒之症狀，以喉嚨疼痛最多，口腔麻木其次，有些人伴隨著流涎、說話不清、吞嚥困難及腹痛等等，正是草酸鈣之強烈辛辣刺激所引起。這種不溶解性之草酸鹽，除非極大量，否則腸胃道不易吸收，因而只造成口腔及腸胃道黏膜之傷害。由於腸胃道不易吸收，並不會造成全身系統性之疾病。

### (三)其他

楊太平先生的二哥楊永興應考到海南島擔任公司職員，戰後返回台灣時，在海上遇到搶匪之情形：

蔣介石撤退到重慶時，四川以東為日本所有，當時日本一個營造廠「西松組」承包在海南島的工程，因日本許多青年投入戰事而缺乏人力，「西松組」到臺灣招考職員，我二楊永興哥就考上了，因此到海南島工作。

戰後，日本成為戰敗國，仍有一艘又一艘的船隻來將海南島的日本人接回去；台灣雖為戰勝國，卻像被遺棄般，任由台灣人自生自滅。二哥於是花錢雇一艘船，召集溪湖、埔鹽等附近鄉鎮的同鄉，相約返國後再付錢即可。船行至中國東南海域，便遇到來自中國的土匪船來搶劫，大家被搶劫一空，只好又回到海南島。第二次雇船時，二哥蒐集日本人在當地所留下的軍火上船。果然半途中又遇到劫船，台灣人奮勇抵抗，加上日本中學生皆有受過軍事訓練的緣故，這次反將土匪們擊退，順利由高雄登陸。（楊太平，訪問記錄 17）

楊永興先生與在海南島當軍夫的楊昌堅先生相同，反應戰後臺灣人返台之困難與國民政府並未即時處理。

## 第二節 南洋地區

### 一、菲律賓

1941 年 12 月 8 日展開珍珠港事件後，日軍同時對菲律賓作戰，於呂宋北部登陸，1942 年初佔領菲律賓，維薩亞群島與民答那峨島之美軍投降。1944 年，美軍登陸雷伊泰島，扭轉局勢，1945 年麥克阿瑟元帥宣佈菲律賓解放宣言，日軍全面戰敗。

#### (一)警察

大正 9 年 (1920) 出生的謝仁和先生，溪湖公學校畢業後，到溪湖基督教會陳天根長老的仁生醫院，擔任包藥與清潔打掃的工作，當時的薪資一個月 18 元，快過年時升為 20 元。在陳長老與先生娘的鼓勵下，和鄰居一起報考警察。

我們一起搭自動車（客運，當時還沒有開始空襲，交通正常）到員林，考

試內容有筆試與口試。筆試寫不太好，但口試的問題，諸如：「日本首相為誰？」「菲律賓總統為誰？」「日本與哪兩個國家結盟？」等問題，平常有聽聞別人說過，或是經由報紙得知，皆可順利回答。

報考者有 75 人，錄取 25 人，我獲知錄取通知後，感覺這一趟旅程為上帝的安排，因為我並沒有積極準備考試，卻有這樣的機會。於是我結束在醫院 11 個月的工作，當時 25 歲，改名為久保和雄，約 1944 年由高雄出發，坐貨船到菲律賓，當時警察隊有 1,000 人來自臺灣。<sup>8</sup>警察隊的待遇很好，月給為 135 元，在台灣的家人可領 100 元，我在菲律賓領 35 元。後來在菲律賓遇到的日本兵，他們是盡國民義務，並無高薪資可領，所以嫉妒警察的薪資待遇，戲稱我們為「月給賊」。(謝仁和，訪問記錄 03)

他服務的所在地是在菲律賓南方的民答那峨島，在那裡的生活與警察工作之情形如下：

那是一個鄉村地方，那時生活簡單、樸素與自由，並不覺得特別艱苦。只有剛開始到達時，有 15 天的受訓，如同軍事訓練，比較難熬，常常五分鐘要完成動作，或是一些不合理的訓練以鍛鍊精神意志。日本政府給我最深的感受是絕對的服從上司命令，不得違抗。聽一位臺灣人說，就算受訓時遭到日本教官虐待，叫他去廁所吃屎，他也得照做，不過戰後他有得到機會就報復那位教官。

警察的工作內容是維持道路、機場之治安，與看管軍用品、汽油。由於身為警察有配槍，受到當地人的尊敬，有時叫他們摘椰子給我們，菲律賓人也會照做。平常多與臺灣人一同工作，也時常講台語，日本長官聽到並不會制止。(謝仁和，訪問記錄 03)

原本是維持治安與秩序的工作，到了時局緊張時也有所改變：

戰爭後期，局勢愈來愈緊張，開始有空襲與丟砲彈，晚上常聽到掃射的聲音，連海軍養的豬隻都被射死。我們的工作內容則多了將石油埋在地底下，以免被盟軍轟炸。

有一回遇到一件很慘忍的事情，日本人要當地人協助將炸藥埋在山裡，為免消息走漏，欺騙當地人說有新部隊要來，所以請他們晚上換新衣服來拍照。回頭卻告訴我們說：「殺人和殺雞一樣，必要時一定要這麼做。」把當地人騙出去後，就一個個開槍殺了他們，月光下一一倒地的情景相當駭

---

<sup>8</sup> 謝先生補充說明，在海南島的稱為巡查補，在菲律賓則稱為警察隊。

人。

非常時期時，我們開始撤退走山，由一位日本人帶領，將物資運送到後方，生活就開始不便。那時過一日是一日，也不知道今夕是何夕，與臺灣的通訊完全斷絕，我們在山裡挖洞、煮飯，避免炊煙被盟軍發現。一路上也曾經看過餓死的人，屍體在陽光下腐爛長蛆，相當可憐。聽年紀比較大的日本軍人說：「打贏打輸都沒有關係，能夠活著回家最要緊！」（謝仁和，訪問記錄 03）

戰爭結束後的情形：

日本長官說不要讓人看不起，該怎麼做就怎麼做，於是我們都很有秩序地將槍械繳交給當地政府，並且進入收容所。收容所將臺灣人與日本人分開，關於戰後在菲律賓的日本人是否待遇較差，或是遭到怎樣的報復，我並不知悉。大概聽說過有些人會報復日本人，例如貨車載日本人時，會有人朝車上丟石頭。

戰敗時，有些人到日軍軍庫中拿鹽、米出來，食物算足夠。收容所是用布篷搭的，一人一張床，有分到糧食與蚊帳，晚上還有臺灣人組成康樂隊表演，沒有鼓就拿臉盆來敲。幾個月後，輪到我搭船回臺灣，在高雄港登陸後，坐火車到員林，再坐五分車回溪湖。戰後的溪湖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只是感覺大家的吃穿並不是很好。（謝仁和，訪問記錄 03）

## （二）軍夫

1920 年出生的黃枝松先生，於 1945 年被徵調到菲律賓，即使捨不得離開妻兒，卻又無法拒絕，只能接受。幸好可以領有一筆頗為豐富的薪資，每個月家裡可領到 100 元，而他在戰地，還有每月 45 元的零用金。當時日軍已經漸入劣勢，所以薪資只領了兩個月就沒有了。他說：<sup>9</sup>

我們搭上船後，上了岸才知目的地是菲律賓，我們負責的工作是是措糧食、彈藥…等，跟隨著部隊四處移防，記得當時是在馬尼拉駐守。當時日軍節節敗退，我們到了馬尼拉後不久，就遭到盟軍的空襲，便跑到叢林裡去躲了一陣子，那陣子常常吃不飽，又要躲美軍的追捕，想想真是蠻慘的；後來到美軍收容所住時，才不再飢餓。日本投降，我在美軍的保護下，搭

<sup>9</sup> 因無法訪問到本人，而引用自溪湖國小的網頁 <http://gsh.taiwanschoolnet.org/gsh2003/2591/talk/peo02.htm> 但文字記錄中年代與實際有出入，如戰爭結束應是 1945 年，而非 1943 年。黃先生敘述自己 25 歲時被徵召，應是 1945 年，非 1941 年。

乘日本軍艦回到台灣。

## 二、印尼、新幾內亞島等

1942年1月，日本攻擊荷屬婆羅洲的塔拉千島、西伯里斯島北部的美那多（老鴨萬）、摩鹿加群島、巴里島的鄧巴薩、荷屬婆羅洲巴里巴板...等地，3月9日荷屬東印度群島的荷軍投降。日軍佔領克威克島，進佔馬金島、搭拉瓦島、東加羅林群島之土魯克島、俾斯麥群島、新幾內亞東北部、所羅門群島的波根維爾（布干維）島...等地，日軍已確立其太平洋外圍防線。<sup>10</sup>

隨著戰爭的擴大，日本政府已開始在台灣徵召志願兵，下一步也有可能徵兵，身為獨子的吳文旦先生，<sup>11</sup>其父親聽聞友人建議，認為當拓南工業的指導員較安全，<sup>12</sup>不用當兵打仗，而決定報名考試。由於通過考試者具有軍官身份，是非常光榮的，吳文旦先生赴台北受訓前一天，溪湖街役場曾舉辦歡送會，在溪湖糖廠的火車站，也有民眾拿著日本國旗、高喊「萬歲」，並有樂隊與遊行隊伍，非常歡樂且熱鬧風光地離開家鄉。在員林與其他人會合，並且參拜神社之後，一同從縱貫鐵路轉往台北。吳文旦先生自述：「怎麼也沒有想到，那麼風光的出發，數年之後，竟是無人聞問，落寞回臺。」<sup>13</sup>

在台北馬場町經過半年緊湊的訓練後，與30名拓南生於昭和18年（1943年）前往印尼西萊姆島。吳文旦先生以「海軍戰事指導員」的身份，負責監督當地原住民採石油，其間因處理工人失誤而造成的爆炸危險，並修理好儀表，升等成為工廠機手（工廠主任），而有幾個月較舒適的待遇。然而，在盟軍的轟炸之下，海軍人手不足，訓練員也被編成軍隊，就被派到新幾內亞島打仗。<sup>14</sup>負責扛機關槍的他，開始過著每日躲空襲的生死關頭：

<sup>10</sup> 劉鳳翰，《日軍在台灣：1895年至1945年的軍事措施與主要活動（下）》（國史館，1997），頁438-440。

<sup>11</sup> 吳文旦先生的經驗由其孫女吳淑真、吳淑敏口述訪問，且收錄在其作品《拓南少年史：探尋拓南工業戰士們的身影》（台北：向日葵，2004），頁75-87，本處資料經作者同意而節錄，並與吳文旦先生的長子吳春雄先生的口述資料相結合，吳文旦先生的南洋事蹟在家族中成為充滿冒險的故事，其子孫對此仍津津樂道。

<sup>12</sup> 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從昭和17至19年共招考四期700名學生，目的是到南洋地區進行石油等資源拓植。招收學生為18至23歲，必須是高等科以上的學歷或是兩年以上相關實務經驗。參閱吳淑真、吳淑敏，《拓南少年史：探尋拓南工業戰士們的身影》，頁39。

<sup>13</sup> 吳文旦先生是拓南工業戰士第一期機械科，介紹他去的田中郡守（按：田中為姓氏，是員林郡的郡守），要他再推薦一些人報名第二期，沒想到第二期的學員在出海途中遭魚雷攻擊身亡。

<sup>14</sup> 1942年，日本軍隊南下至新幾內亞島，同時進侵荷屬新幾內亞及東部澳大利亞的領土，使本島東部和北部的高地成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西南太平洋的主戰場。

有一回戰況很激烈，當時大家都躲在防空壕大坑裡，伺機開槍反擊。當時是一層日軍、一層盟軍，外面再一層日軍、一層盟軍，真的是重重包圍，戰況究竟如何，無人知道，只知道一有人探出頭來，就立刻被槍砲擊中，因此我們躲在壕洞中不敢動彈。沒想到竟又下起雨來，防空壕變成大水坑，我整個人泡在水坑裡動彈不得。美軍炸了三天三夜仍不停火，我只勉強露出鼻孔呼吸，等彈響沒了，自己也全身麻痺、動彈不得。

還有一回雙方對打，你來我往，我被自己的機關槍後座力撞得昏了過去！等醒過來，才發現旁邊的人差不多全死光了，連我一共只有三個人活下來。於是三個人繼續前行，想找其他伙伴，卻被敵人發現，只好高舉雙手，假裝投降，然後趁機跳入旁邊低處的壕溝逃走。我們在叢林逃亡時，曾經遇到巨蛇，大家合力用機關槍掃射十幾顆子彈，才射死它。大家把它的肉切下來吃，裝了十幾米簍才裝完。

在南洋的日子，我們隊上的糧食都是卡車運來的，逃命的時候也都沒有糧食，只要看到村莊，大家都過去抓他們的雞、羊來吃。卡車一來，我們就坐到有人住的村莊，當地住民看到我們就會雙手抱頭，對我們又敬又怕低下頭才敢走過去。

戰爭結束後，成為美軍的俘虜，美軍瞭解臺灣人的身份與日本人不同，對於俘虜營內的臺灣人管制較為輕鬆，也毋須服勞役。吳先生父祖輩以經商為業，此時亦展現其做生意的長才：

我在牢區的鐵網旁，看到過去在工廠工作的當地土著，就在網子旁邊聊了起來。以前我在工廠做訓練指導員時，領了月給無法寄回家，總會買些東西請底下的工人吃，所以土著和我的感情很好，也很尊敬我。那時他們聊到想買「沙龍」，那是一種由上而下，套籠全身的衣服，他們是否有沙龍可以買。我從小跟著父親做生意，可以說是天生的「生意子」，立刻就動起生意經。我問他們有什麼可以用來買沙龍，土著說，一件沙龍可以換五包香煙、五包餅乾和五個罐頭。

當時關在那裡的軍人其實是一無所有，只有和我們關在一起的日本商社的人有錢，因為過去賺了很多金銀財寶。我就問商社那些人說，如果有沙龍，可以換到一包香煙、一包餅乾和一個罐頭。由於關了很久，大家都很想念香菸，紛紛拿出來換。東西多到我一個人沒辦法搬！所以每過幾天，我就要找兩三個伙伴一起到鐵網旁邊，才能搬回來所有交換來的貨品。

有一兩次，在搬貨物的路上，遇到美國大兵來盤查，我們就大喊著：「I no

Japa, Formosa！」他們就不會管我們做什麼了。我把換回來的貨物，除了和臺灣伙伴分享，多出來的貨物又再慢慢分次賣給商社的人，換了不少東西，有：皮鞋、西裝、襯衫、黃金，甚至珍珠和鑽石，一心想著可以等到戰後帶回家當禮物。

在南洋所遇到的傳染病也是特殊的當地經驗，吳先生學會治療赤痢的秘方，返鄉後將此法傳授給開西藥房的結拜兄弟：

在收容所裡，曾經爆發赤痢，日本兵因它而死的人相當多。我記得那時有一條水溝，水已經乾涸了，大家都是蹲下去那裡上廁所。得到赤痢就會不斷腹瀉，因為根本沒有藥，很多日本兵一下去以後，一個個腹瀉不止，一直放血，就再也站不起來，倒地而死，一條溝裡死了很多人。後來有一位在地居民看到死傷那麼多，十分不忍，就教我們當地治療赤痢的秘方，因此救活了很多。

一年後，準備搭上返鄉的船回臺：

返鄉的日子終於到了！我學美國大兵，在兩隻鞋底各釘上一個三吋高的鞋跟，然後把鞋跟挖空，一隻藏著鎔掉的金條，一隻藏鑽石、珠寶，再封起來。裡面有好幾顆拇指大小的鑽石和珍珠，實在是一筆可觀的財富！

回程是由日本派人來接，船長及所有的船員都是日本人。我是在第一站上船，一路沿海載回臺灣兵，整整坐了一個月才抵達臺灣。由於我是拓南第一屆軍官，交了不少朋友，大家都推我做臺灣人團團長。當時所有的臺灣兵都很窮，由於我在被俘期間，和當地土著與日本商社間的生意，賺了不少東西，衣服很多，皮鞋有五、六雙，西裝也有好幾套，我留了一套，其他都分給船上的朋友。但是，在海上回程中，一些耳語傳了開來，有人說船並不直接回臺灣，要先回日本，領回日本政府欠我們的薪餉。當時傳說海軍有一種檢查的機器，若藏有金屬類或金銀珠寶，都可以檢查得出來，而且，如果被查出來就會再被送回南洋，關上二、三十年。

船上有一位同鄉是從鹿港一起被派去南方，因為投緣，常互相傾訴，我們對對方的家庭都有瞭解。他勸我：「有命，就有錢。」他說我若真的被查出來，再送回南方，一家人將是如何地傷心！不值得冒險！於是趁著黑夜，我挖開鞋跟，偷偷把珠寶投入大海。結果軍船竟然是直接航回臺灣，在基隆碼頭靠岸。那批在黑夜中沈入大海的珠寶，想起來仍是叫人心疼！

由於戰時通訊困難，家人也不知道吳先生的情形。吳文旦先生返鄉時，在溪

湖驛遇到鄰居，鄰居一認出是他，趕緊先騎腳踏車到他的家報佳音，長子吳文雄先生說：「我的爺爺高興地騎腳踏車載著我去迎接父親，奶奶和媽媽在庭前跪下感謝老天爺，讓我們一家終於能夠團圓了！」

### 第三節 日本

除了被動地被徵召為軍夫以外，許多年輕人也在思索自己的未來，除了為國家出征以外，是否其他的出路？有些人採取考試的方法，希望能夠兼顧生計。

#### 一、東京陸軍少年飛行學校

昭和元年（1926）出生的林才壽先生，<sup>15</sup>新水公學校畢業，每天走路來回各四十分鐘到溪湖就讀兩年制的高等科。從他述說自己從軍的背景與動機，也可看出大時代之下早熟的少年如何思考未來出路：

父親也沒有自己的田地，是佃農，因此我的家境當然不好。日本統治臺灣的政策是有差別的，日本人是一等國民，台灣人是次等的。例如當時同樣是擔任老師，但日本教師的待遇就高於臺灣教師。警察對待臺灣人很嚴格，臺灣人做不好，就會被叫來打一下。於是讀小學的我，常思考臺灣人如何出人頭地？何時才可以得到平等公平的生活？可是臺灣在身為殖民地如何突破呢？

高等科畢業後我就到台北找工作，到餐廳做「小孩工」，學煮飯。餘暇時買書自修，得知有報考日本東京陸軍少年飛行學校的消息，就開始認真準備。當時認為公務人員也無法逃避差別待遇，不如當兵，軍人世界只有階級之分。

我準備考試有自己一套記憶法，所以將日本歷史、年代背得滾瓜爛熟，通過考試、口試與體格檢查。還記得考試時發生的趣事，自己真的很幸運，考試前一天在報紙上看到正常人血壓多少的報導，沒想到第二天就考出來了！在台北考試通過後，有身家、品德調查，看看家裡是否有人犯罪，沒有不良紀錄才可以加入軍隊。（林才壽，訪問記錄 05）

林才壽先生在動盪的時代選擇成為少年飛行學校學生之方式，能兼顧經濟與

---

<sup>15</sup> 因林才壽先生有二二八受難經驗，曾接受訪問而刊載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歷史》第四期。

被殖民者出路之考量，遠赴日本求學，在日本所接受的軍事訓練情形如下：

16 歲考上日本航空學校（東京陸軍少年飛行學校）甲種第十五期。第十五期的學員當中，日本有四千人，臺灣人才四人，能夠考取非常困難。得到考試及格通知單，除了從台中到基隆港這段路的交通費自己出，其他船票、讀書費用都由學校支付，赴日就讀軍校，毋須擔心經濟負擔。軍校的待遇很好，如同今日的軍校也有月給，軍隊的生活也較其他地區好。即使知道我是臺灣人，但是在日本軍校時，並無差別待遇。或許大家都是 16、17 歲，並無種族觀念，一個中隊將近 200 人，我在第九中隊，也或許只是眾多中的一個臺灣人，身為臺灣人的身份也沒有特別被強調。

入校第一年為日本軍隊之軍紀訓練學校，後兩年為專科訓練學校。第二年結業即編為「正規軍人」，軍階為「陸軍航空上等兵」，繼續就讀滿三年即畢業。軍校的教育是：「軍人的任務就是為國效死！」我們被教育成不怕死，願意為國犧牲，甚至也是被教育成「日本人」。我也認為，如果有機會為國效命，犧牲性命也是應該的，那時也有些同學擔任特攻隊而戰亡，大家都將近 20 歲，尚未成家立業。（林才壽，訪問記錄 05）

由於戰爭緊迫、亟需軍事人員，他的學業也縮短完成，被編入軍隊服役：<sup>16</sup>

陸軍少年飛行學校原本要三年才可畢業，由於戰局緊急所以縮短為兩年半結束學業，畢業生們編入各航空作戰單位服役。昭和 19 年（1944）4 月 1 日由日本生徒（學生）改任陸軍航空上等兵，即正規軍人，那年我 19 歲。派至山口縣小月飛行部隊服役，<sup>17</sup>軍階是陸軍航空兵長、勤務伍長，相當現在下士官級。整個班都是日本人，而我是臺灣人當日本新兵的班長！實現我小時候的夢想！臺灣人也可以在那個時代出人頭地！日本教育中有一句話：『汝草木と同じく朽んか？』中文意思為做人要立志留名青史，不要像草木或落葉般，時候到了就入土腐爛，什麼也沒有。我在軍校的表現，就是受這句話的影響。

我的部隊在本州沿海偏僻處，並沒有遇到很多正式的空襲，空襲一般是在大都市有軍工廠的地方。不過，曾有一次掃射令我印象深刻。身為班長的

<sup>16</sup>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就讀大津陸軍少年飛行兵學校的黃華昌先生，他指出太平洋戰爭後戰場擴大，需要更多的飛行員，於是在東京陸軍航空學校之外又增設分校，大津則是其中之一。黃先生自大津畢業後，於 1944 年轉往熊谷陸軍飛行學校正式接受駕駛機訓練，但因戰局緊迫使「飛行訓練草草結束，學校也在（1945 年）二月底關閉，來不及為我們 17 期學生舉辦畢業典禮，就把我們編入實戰部隊，派到各個航空基地。」參閱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台北：前衛，2004），頁 90-101。

<sup>17</sup> 林才壽先生補充說明：此地位於日本九州本島與日本本土之最先端的位置，在此服役半年，日本無條件投降而回臺。

我是指導新兵修理維護飛機，有一日中午吃完午餐後，感覺整個部隊很安靜，沒有什麼人走動。我正在營隊裡行走時，突然一架戰鬥機「碰碰碰」掃射而來，我眼睛一閉，趕快趴下，子彈從我身邊掃過，鼻子聞到硫磺硝煙味。日本軍隊有一句俗語說：「新兵第一次聽到槍聲，就會腰軟全身無力。」當時的我的確是腿軟，心想要是戰鬥機返回再掃射，後果將不堪設想。想跑卻爬不起來，嚇得無法動彈，只好滾到路邊，滾下約兩米的低窪處，當時也不覺得痛，只想要活命。可能上級幹部得知有空襲警報的消息，但是並無發佈消息，只有一架小飛機，卻不巧只有我遇到。（林才壽，訪問記錄 05）

雖然身為軍人，對於戰爭發展的資訊與戰敗的消息卻不太清楚，戰後返鄉的過程如下：

那時並不知道戰爭的消息，日本的內務大臣以軍治國，嚴格控制言論、廣播與新聞，日本人的愛國心很強，我連被投下兩個原子彈都不知道。1945年8月15日天皇宣布失敗，天皇的話，沒有人會反抗，既已聽到這個消息，大家很難過，無法為國效命，有些人甚至當場自殺。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軍隊解散、交出武器，聯合國派人來接收。辦理退伍後，日本政府也無能為力，任由我們自生自滅，我已離家三年，剛開始一年與家人尚有通信聯絡，但後來因戰局交通不便，即使信有寄出去，郵輪也無法送達。

當時部隊內的人事管理官問我要去哪裡？我說：「我們的國家(日本)走到這個地步也沒有辦法。」返回臺灣的交通也不那麼確定。他說：「我們家應該還可以提供溫飽。」於是帶我回家安頓，幾個月後獲知臺灣有集中營負責遣回。直到1946年元旦時，免費搭船回到基隆港。基隆港可看到戰爭轟炸後面目全非，看到的中國兵不是正規軍，而是土兵，聽說是被圍起來抓來的。所以看到的是穿草鞋，拿槍當扁擔吊東西，這因中國經過八年抗戰後的窮苦模樣，這是沒辦法的事。雖然臺灣人看不過去，但這些中國兵有槍，拿子彈打死人，政府是不管的。

返鄉的路上，坐著火車看著很多地方都被轟炸過。從溪湖車站一路走回家，大概要四十多分鐘，從讀書時代就是這樣走路上學。從日本帶回臺灣的，只有所謂的消耗品，例如綁腿的帶子、軍毯、軍服幾套而已。（林才壽，訪問記錄 05）

## 二、日本高座海軍工廠

昭和 18 年(1943)，日本高座海軍工廠開始生產雷電機與紫電機，<sup>18</sup>先在日本國內招募第一期的工作人員，從第二期開始才在臺灣招募。直到二次大戰結束，一共招募七期訓練，有八千四百多名臺灣少年赴日，從事讀書與組裝飛機的工讀生活。

在困苦環境生長的青年孩子，由於以少年工身份赴日，可以得到穩定的薪資，算是報考動機之一。住在埔鹽鄉的陳崇墩先生說：「少年工算是半工半讀，不僅有學歷、薪資，五年後有具有技師（高等官）資格，條件頗為吸引人。」<sup>19</sup>同時，公學校老師的鼓勵也是推力之一，住在溪洲鄉的蔡天開先生說：

黑夜裡，想起因為家貧，在寺田老師鼓勵之下，與班上成績好卻無法升學的同學們一起報名考試。雖然母親一開始並不答應，但考取後，寺田老師到家中拜訪，告訴母親這是個好機會，使貧窮、聰明又守法的孩子能有機會賺錢，也可以得到技師資格，有助於將來發展，母親才同意蓋章。（蔡天開，訪問記錄 36）

溪湖街於昭和 6 年（1931）出生的廖火爐先生也是如此，他是日本第七期海軍高座工廠台灣少年工，身為家中的獨子，溪湖公學校畢業前偷偷地拿父母印章去報名，主要的動機是為了將來發展而打算。

父母得知我錄取後，雖然不捨，但也無可奈何，當時的我，並不希望只是在家裡做農事而已。3 日後便搭五分車到員林，再坐火車到高雄。戰爭後期相當緊急，我們在高雄並無什麼訓練，便乘船赴日，途中行至黃海，遇到敵方以魚雷攻擊，大家非常緊張，穿起救生衣待命。那時或許船長熟悉航路的緣故，將船轉個方向就離開魚雷的攻擊。因戰爭的關係也使去日本的航程時間拉長，在船上有許多人暈船。

接著，我們到佐世保軍港登陸，住在旅館時，大家在此改成日本姓名，我的日本姓名是久富政吉。那時我想要買縫衣用的針寄回家，在附近的商家詢問，當時店家回答我：「吶尬。」我想這可能是日本的方言，猜測應該是「沒有」的意思。（廖火爐，訪問記錄 06）

第七期的廖火爐先生在岡山受訓的時間較為急迫，花壇鄉的曾天來先生為第

---

<sup>18</sup> 雷電機可以在 15 分鐘內爬升 10000 公尺高，用以對抗美軍 B29 轟炸機。

<sup>19</sup> 陳崇墩，訪問記錄 37

二期生，對於在台灣受訓才有較深刻的印象，他說：

由於參加第二期的臺灣人年紀較大，將來準備當小幹部，訓練也頗為嚴格。在岡山的訓練生活如同軍隊般，早上五點天未亮起床，五分鐘內梳洗完畢後吃飯、出操，像現在的陸戰隊，訓練大家的日本人或高中畢業的下士很兇。雖然只有 21 天，但曾經因為這種嚴格的訓練想要偷逃走，但又擔心偷跑被抓回來，警察抓不到本人就抓父母。日後覺悟，將來若能過安定的日子，什麼苦都要撐下去。(曾天來，訪問記錄 35)

廖火爐先生抵達日本後，先是到高座廠受訓，受訓結束後進入名古屋三菱仕上工廠，再轉至兵庫縣姬路市的川西航空機株式會社，最後又調回高座本廠。在高座廠受訓的生活情形，同樣是第七期的蔡天開先生有較深刻的印象，<sup>20</sup>他說：

當時是春天，還下著霜雪，天氣很冷，將能穿的衣服都穿上。兩天後坐火車到空 C 廠，一看見煙囪以為是工廠所在地，原來是為大家煮飯的大灶，用很大的鍋鏟煮飯，空 C 廠的伙食很少，小碗的飯配兩塊菜豆，都吃不飽。

空 C 廠的生活上午是國語、英語、算數課程，下午是實習與軍訓。因為那時有學英文的緣故，戰後回臺考初等考試可以通過。當時的日本教官很好，常常要大家天熱時跑操場，最後帶大家跑到松林裡，在松林裡舒服地午睡，睡醒命令大家打赤膊跑回來，讓其他人看了以為我們去特訓，其實是休息。

比較難受的是一週洗一次澡（有熱水），後來發現原來是跳蚤、白蟲的蟲卵在肥皂裡，惹得大家又癢又難過，才用熱水燙過衣褲與毯子。(蔡天開，訪問記錄 36)

身為最後一期的少年工，他們在日本的經歷是躲空襲比工作時間還要多，廖火爐先生曾經有三次歷劫歸來之經驗如下：

昭和 19 年(1944)12 月發生嚴重的名古屋大地震，工廠裂開成一個深溝，我是用爬的逃出來。接著又遇到嚴重空襲，而有三次死裡逃生的經驗。第一次躲在防空壕裡，我是最後一個進去，已經沒有位置坐，只好挨在日本人的膝蓋上。轟炸時，眼看著防空壕的屋頂灰塵一直抖落，直到防空壕坍塌，我被坍塌的土堆掩埋至胸口，手腳被椅子夾住無法動彈。感覺到背後

---

<sup>20</sup> 蔡先生為彰化縣溪洲人，彰化縣政府地政科測量員退休，退休後在彰化縣文化局擔任義工至今，目前擔任臺灣高座台日交流協會理事，及彰化縣留日高座同學協進會總幹事。

的日本人流鼻血到我身上，至於他的生死，我也不知道。空襲一段時間後，有憲兵來救人，我才被救出，所幸只損失一隻鞋，事後聽說那個防空壕裡死了二十多個日本人。

第二次是早上天剛亮時，我們還在睡覺就遇到空襲，我抓著棉被從床上跳起，一路跑，將棉被掩護頭部，一面看著炸彈直直落下。我被炸彈爆炸的暴風吹起，掉進一個無水的水溝底，嚇得以為頭部有被子彈掃到，幸好沒有，趕緊用棉被包裹住自己的身體。空襲結束後，觸目所見，是肚破腸流的屍體與肉醬，那景象非常駭人。

第三次是夜晚時躲空襲，我躲在魚池旁的水泥管處做掩護，比較安全。因為我去日本的時間是戰爭後期，幾乎都過著躲空襲的日子，也無法與家人聯繫。(廖火爐，訪問記錄 06)

在戰爭末期的轟炸下，曾有 64 位少年工不幸犧牲，根據 1999 年 10 月日本政府報導，臺灣少年工合祀在靖國神社有 52 位。這些名單中，主要是昭和 19 年(1944)12 月 18 日，美軍 B29 轟炸機空襲名古屋市三菱航空機場時所犧牲。其中彰化籍佔 23 位，包括員林鎮 5 人、大村鄉 4 人、田中鎮 3 人、二水鄉 4 人、埔鹽鄉 1 人、埔心鄉 2 人、田尾鄉 1 人、北斗鎮 1 人、溪州鄉 1 人、竹塘鄉 1 人。再加上中島廠戰死者有花壇鄉 1 人、高座本廠鹿港鎮 1 人，共計 25 人。

戰爭結束後，少年工成了無人管理的棄嬰。於是組成自救會，處理大家生活的事務，以及與各方交涉返國事宜。平日吃倉庫內剩下的米糧，以及人家不要的菜頭回來煮湯，由於失去工作，有些人就是看書、休息或唱歌打發時間。返台前，少年工的編組就不是以「期」分組，而是以家鄉分組，所以有一個「台中州大隊」，集合所有住台中州者一同返鄉。廖火爐先生也是其中一位，他說：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後，我們就在高座廠等待返國，當時沒有工作做，幾乎都在休息或玩，直到 12 月才輪到我搭船返國。但船出了問題，在橫濱港修理，延誤了行程，回到臺灣已是隔年元月 3 日。在基隆港下船，當時身上約有一千多元的日幣，於是買些好吃的東西，例如香蕉。回到溪湖時已經是三更半夜，很開心地撞門進來。(廖火爐，訪問記錄 06)

目前蔡天開先生保存一本昭和 20 年(1945)10 月 1 日編製的《高座海軍工廠台中大隊一〇八寮第六中隊》名冊。名冊第一頁為大隊長、中隊長、兩位中隊副官、第一至第四小隊長，以及烹炊長與主計班長，記錄其中文姓名、日文姓名、工作單位、畢業學校與在台地址。例如：

黃啟程（廣田啟程） 大隊長 台中第一中學校 記錄員

台中州彰化市大埔七一二

第二頁開始為一號室到二十號室之名單，含少年工之中文姓名、日文姓名、歲數、工作單位、畢業學校與在台地址。每戶在籍人員十二名，一共 240 名，另外又記錄就寢時人數，一共 233 名。每戶成員大部分來自同一鄉鎮，此中隊為日治末期居住在台中州彰化郡人，即現今彰化市、秀水鄉、芬園鄉、鹿港鎮、福興鄉、線西鄉與伸港鄉。

其工作類別有記錄員、電氣員、檢查員、機工員、整備員、仕上員(品管)、運轉員、會計材料、組立(將一堆堆零件組裝好)、木工、銅工、機械、作業、見習工、總△部(總管)、養成所、冶具、物資部、胴翼(負責飛機肚與機翼)、鑄造、般裝(在廠內搬運零件供組裝)、烹炊、熔接、塗工等。

另一本同為蔡天開先生保存的《高座空 C 廠臺中大隊第二回歸國者名簿》，為涉外委員會於昭和 21 年(1946)製作。名冊有中文姓名、日本姓名、年齡、歸台先(臺灣住址)與保護者(戶長)姓名。全為手抄本，蔡天開先生說難免有筆誤，例如他本人的資料就有誤。至於有些姓名被劃掉，並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名冊內成員統計如表 4-1：

表 4-1 高座空 C 廠臺中大隊第二回歸國者名簿內街庄人數統計

隊名	郡名	街庄名	人數	總計
第一中隊	北斗郡	沙山庄	13	206
		埤頭庄	14	
		二林街	37	
		北斗街	55	
		溪洲庄	52	
		大城庄	4	
		田尾庄	10	
		竹塘庄	1	
	竹山郡		18	
其他		2		
第三中隊(105 寮)	員林郡	溪湖街	3	64
		永靖庄	33	
		二水庄	20	
	其他		8	

續表 4-1 高座空 C 廠臺中大隊第二回歸國者名簿內街庄人數統計

隊名	郡名	街庄名	人數	總計
第四中隊	員林郡	大村庄	22	241
		坡心庄	14	
		溪湖街	28	
		社頭庄	30	
		田中街	51	
		二水庄	1	
		埔鹽庄	15	
		員林街	80	
第五中隊 乘船名簿	彰化郡	和美街	22	61
		花壇庄	16	
		線西庄	1	
		彰化市	4	
		其他	18	
第六中隊	彰化郡	秀水庄	19	206
		鹿港街	44	
		福興庄	24	
		芬園庄	17	
		線西庄	12	
		彰化市	86	
	其他		4	
總計				778

資料來源：《高座空 C 廠臺中大隊第二回歸國者名簿》（涉外委員會，1946）

名簿中登記住址於溪湖街有 31 人，年齡在十四至二十三歲之間，其資料如表 4-2 所示：

表 4-2 高座空 C 廠臺中大隊第二回歸國者內溪湖街之名單

姓名	日本姓名	年齡	地址	戶主
黃金興	廣田邦彥	20	員林郡溪湖街崙子腳五六八	黃興隆
黃金傍	廣田毅仁	21	同上	同上
武傳信	竹村傳信	20	同上	字跡不清
鄭聯慶	平島靖雄	21	員林郡溪湖街溪湖三七一	鄭印
蔡宗地	大元哲男	21	員林郡溪湖街西勢厝九三	蔡長榮
楊間風	柳村廣志	17	員林郡溪湖街大突字大竹四一五	楊愿
陳崇米	田川崇米	18	員林郡溪湖街崙子腳四三四	陳通

楊進財	柳井久榮	18	員林郡溪湖街崙子腳五三六	楊慶章
巫完和	平山康次郎	17	員林郡溪湖街頂寮八二〇	巫之獻
徐金發	福□清太郎	17	員林郡溪湖街汴頭一一三	徐氏（働）
陳仲	東田仲	17	員林郡溪湖街崙子腳六三	陳所
卓爾遜	卓上爾遜	17	員林郡溪湖街溪湖六〇	卓義發
楊昌志	洪川富一	14	員林郡溪湖街田中央二〇五	楊水言
楊清龍	柳村龍夫	16	員林郡溪湖街巫厝一五三	楊氏完
李榮茂	森田俊雄	19	員林郡溪湖街溪湖三一〇	李光陽
楊蛟	柳川光秀	17	員林郡溪湖街阿頂厝	楊道
楊益發	柳川益弘	22	員林郡溪湖街西勢一〇九	楊槌
楊茂松	柳川茂男	21	同上	同上
陳益評	東正五郎	18	員林郡溪湖街大突四八	陳秋
巫和成	平山和成	18	員林郡溪湖街頂寮七七	巫學
陳炳欽	永田欽次郎	17	員林郡溪湖街四塊厝巫厝三八三	陳長
陳再來	田川國男	17	員林郡溪湖街溪湖二三一	陳定
陳天賜	藤田靖次郎	16	員林郡溪湖街溪湖二一三	陳氏枝
楊律	柳村芳雄	18	員林郡溪湖街汴頭六二六	楊川
楊援	柳村一郎	16	員林郡溪湖街汴頭五八	楊反
黃萬來	岡田広士	17	員林郡溪湖街崙子腳六三七	陳氏伴
黃守	橫田守	18	員林郡溪湖街崙子腳七七	黃柱枝
洪泗川	香川義男	17	員林郡溪湖街四塊厝一一	洪秋木
洪錦江	三井錦一	23	同上	同上
何樹松	池田重吉	16	員林郡溪湖街大竹圍一二三	何萬生
王禮圖	大原中弘	17	員林郡溪湖街溪湖二三四	王秋河

資料來源：《高座空 C 廠臺中大隊第二回歸國者名簿》（涉外委員會，1946）

除了等待遣返以外，也有比較年長的少年工會另謀其他出路，如已經十八歲的曾天來先生當時選擇與伙伴離開宿舍，他述說當時的情景：

戰爭結束後，我原本住在一舍八寮，我們成為無人管的狀態，所以聽說有九州針尾有收容所，就和一個同窗到那裡向收容所（復原所，日人返回，空船再載台人回臺的暫時居住地）索取食物，當時吃不完還會送給從中國返日的日人，有些女人很可憐，獨自一人帶兩三個孩子。在收容所居住一週後，日政府會發毯子、衣褲和金錢一千或兩千元讓你離開。我在九州待了兩個多月，遇到過年還發清酒喝，也有糖吃，如果原本待在高座廠就沒有吃那麼好。那時還有批貨賣香煙給美國大兵，可賺取一倍的錢。也在那裡遇到臺灣青年隊的人，是從南洋當兵回來的。

返國當年 19 歲，在基隆上岸，因為美國憲兵帶我們回臺，並無遭到國軍搜身。(曾天來，訪問記錄 35)

戰爭結束後，約有一百多人因結婚或選擇留在日本發展，以及不幸的 64 名台籍少年工在美軍轟炸時客死異鄉，或有水土不服病歿日本。大部分的少年工坐上輪船返回故鄉，展開「另一個時代」的生活，短短三、四載的半工半讀的日本經驗，隨著戒嚴而塵封，早年只能私下以聯誼會的名義聚會。四十年後，政治局勢轉為開放，才能公開聚會與赴日紀念，為犧牲的同伴上香。<sup>21</sup>

彰化縣拔得頭籌，於 2001 年 10 月首先成立「彰化縣留日高座同學協進會」。至 2003 年 3 月方有「台灣高座台日交流協會」之成立，目前有二十區會分佈全台，每年仍定期舉辦旅遊等聚會，將大家的情誼維繫在一起！並且與日本的高座同學會有所聯繫，邀請其來台參訪。最具紀念性的活動，為 2004 年，有六百多位臺灣少年工赴日舊地重遊，參加日本內閣厚生省與「高座日台交流之會」所舉辦的六十週年紀念會，領取因戰亂而無法得到的「畢業證書」與「在職證明」。等待了六十年所取得的證書，代表這斷裂的人生經驗重新受到肯定，也讓白髮蒼蒼的老先生們能如願以償。

### 三、留學生

昭和 2 年（1927）出生的楊體胖先生於溪湖公學校畢業後，隨家人赴日本東京求學，其留學生時期正值日本遭受轟炸嚴重，對於在日本當地的空襲有深刻體驗，他說：

我就讀的關東中學有日本人、臺灣人與朝鮮人，大家雖然一起讀書，事實上會依照國籍不同分派系，有糾紛時都會成群結黨。三年級時，珍珠港事變引爆太平洋戰爭，美軍對日本的空襲愈來愈激烈。空襲前美軍會從空中拋下宣傳單，說明空襲的時間與地點，警告大家。各地都有搭建防空壕，常常是躲在臨時作為掩護的大溝中，一次可以躲好幾百人，有時水深至脖子也要想辦法保住性命。空襲嚴重的時候，整個電線桿都炸起來，房子都燒起來。

四年級時，東京各地的中學生（男生）被召集到富士山附近的營區，進行為時數週的演習，主要是日本精神的愛國教育。我們由學校出發，像步行

---

<sup>21</sup> 彰化縣的同學聯誼會於民國 74 年開始舉辦，第一屆留日臺灣高座全國聯誼會則於民國 77 年開辦。至民國 91 年為止，共舉辦 15 次全省聯誼大會，除了花蓮、台東與澎湖外，各縣市皆有區會，輪流主辦。

軍一樣走了好幾天才到營區，大家都很遵守教官的指示，夜晚時就在路邊睡覺。軍事訓練時我們曾經使用真的三八式步槍練習，只是沒有子彈而已。

戰時食物採取配給制，必須向公所申報戶口，政府會發給一個月九十張食卷，當時還是青春期的我會覺得不夠吃。因為學生是拿甲種食卷，跟勞動者的丙種食卷比起來，飯量太少了，有時我一餐就用掉兩張。有些日本朋友會從鄉下帶一些食物來分給大家，或是一群同學們到鄉下的呀米(黑市)買東西。(楊體胖，訪問記錄 08)

1945年3月，楊先生讀完五年制的中學，同時考取醫學院，可惜戰爭持續進行，醫學院根本無法開學。他跟著其他人繼續躲空襲：

東京進行疏開，<sup>22</sup>我只好跟著幾個來自大甲、民雄的同學一起投靠一位史地科的臺灣老師，他是來自台南新營的莊木老師。他們已舉家遷移到日本鄉下，我們一起在那邊過著躲空襲的日子，幸好家人從臺灣給予經濟支柱，否則在當時的情形很難生活。

愛國教育告訴我們：日本是最勇敢、一級棒的民族，其他國家都比不上。而我曾經目睹空襲時，高射砲打下來的美軍飛機有女性駕駛員，或是女性的飛行員，可見美國軍隊連女生都很厲害，並非日本所說的。日本精神要我們戰到最後一刻，即使是「竹竿接菜刀」也要繼續對美國人打下去，但一連串的轟炸與空襲之下，只能保住性命就很好了。(楊體胖，訪問記錄 08)

直到8月15日，日本投降後，楊體胖先生加入在東京的臺灣人所組成的互助組織，並等待返家的時機，他說：

陳文彬與蔡長壽的弟弟蔡長庚等人在東京組成「臺灣同鄉會」，<sup>23</sup>我參加該會，並協助整理名簿等文書工作。陳文彬先生為大學教授，德高望重，利用時間教我們怎麼說北京話；蔡長庚先生是拳頭師傅，跆拳道八段，教我們自衛的招數。戰後很自然將臺灣視為中國的一部份，美國也將台灣視為同盟國的一份子，對於同鄉會有很好的照顧，曾經在協調過後，贈與同

<sup>22</sup> 1945年3月10日，美軍便以324架B29飛機裝載了兩千噸燃燒彈，在東京進行地毯式的轟炸，造成了八萬四千人被炸死，一百五十萬人受害的大災難。

<sup>23</sup> 旅居日本的台灣留學生、華僑在二戰結束後，準備集體返台。由於日本缺乏船隻，對台交通尚未恢復，留日的台籍知識份子就利用等待的時間，做一些返台的準備工作。於是分別組成了各種各樣的小團體。陳文彬所屬的光復會於1945年9月，與其他在東京之華僑團體結合為「東京臺灣同鄉會」，協助滯留日本的臺灣人生活問題與返鄉工作。參閱湯熙勇，〈烽火後的同鄉情：戰後東亞臺灣同鄉會的成立、轉變與角色（1945-48）〉，《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9：1（臺北，2003），頁1-49。

鄉會五輛吉普車、足夠的糧食與衣物。我們曾經很高興地迎接麥克阿瑟將軍的車隊進入東京，戰後因臺灣光復了，「臺灣同鄉會」非常高興而在東京舉行遊行慶祝，一些日本人看了眼紅，竟然用槍射擊我們，有五位臺灣學生因此喪命，其中一位是溪湖大突頭的楊廣。

當時我的父親一直寫信要我返鄉協助家業，於是當同鄉會協調遣送臺灣學生回臺灣時，我是搭著第一批的船，經過四日三夜的航行到達臺灣。當時離開臺灣時年紀還小，中學一年級時曾經回臺灣一次，戰後回到員林時差點不認得返鄉的路。（楊體胖，訪問記錄 08）

楊太平先生的四哥原是台中州立彰化中學的學生，<sup>24</sup>四年級時考取日本少年戰車兵學校，因而赴日受訓，以下為楊永德先生赴日原因與返鄉過程：

四哥楊永德正就讀彰中三年級，原本中學校是五年制，因戰爭的關係減少成為四年制，政府又鼓勵學生參加少年戰車兵、少年航空兵、少年軍艦兵、少年海員的考試。高等科與中學生被稱為「少年」，我的四哥就到日本參加少年戰車兵，他在東京往北的宇都宮當兩年的戰車兵訓練，本來受訓完成，正在港口等船隻要往緬甸，幸好戰爭結束就不用去了，否則可能無法活著回來。

戰後有許多船隻來往日本與台灣之間，免費運送台灣人、日本人各自回自己的家鄉。四哥回臺灣後，並在彰中復學，由於已經比別人晚開始上課，課程內容已經改成中國語文，四哥無法適應，決定改回日本姓名，到日本發展。（楊太平，訪問記錄 17）

---

<sup>24</sup> 彰化中學今國立彰化高中，創建於昭和 17 年（1942）4 月 27 日，原名台中州立彰化中學校，為四年一貫制，戰後改名為臺灣省立彰化中學。